

## 危难之时显身手<sup>①</sup>

### 讲述者

余启颖，中山二区下泽人，1936年任二区民众教育馆馆长，是抗战期间二区救护队主要发起人，时为中山县二区民众抗战后援会常委。

谭则刚，中山小榄人，时为小榄下基小学教师。

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在敌后方，战时救护对于挽救指战员的生命，减低伤亡率，鼓舞部队士气都具有重要意义。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一幕幕拉开，那些在危难之时显身手、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自然而然浮现在人们眼前。这其中，也有中山人奋斗的印记。

### “白手兴家”的二区救护队

抗战军兴，举动动员。中山县各区抗敌后援会和所属救亡工作团纷纷成立。二区救护训练班也在抗战硝烟中开班，并随后成立了二区救护队。由于条件所限，成立后的救护队员一没有工资；二需自己准备一套制服；三要接受军事训练；四要服从编班日夜执勤；五要自行负责集中时或值班往返车费；六不能免兵役。全凭自身爱国热情、抱着为抗战献身精神而参加。1939年，日寇两次入侵横门，横门保卫战爆发。该救护队奔赴前线，参与战地救护。

（以下是余启颖讲述）救护队成立，全靠我们白手兴家。经过一番努力，才逐步使药品、器材和设备购置齐全。靠着区内热心人士的资助，每个队员还有一件钢盔。训练时，利用队员值勤之机，加强技术复习。在五

<sup>①</sup> 余启颖讲述摘自：《抗日战争期间的二区救护队》，原载于《中山文史》第四、五、六合辑，政协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谭则刚讲述摘自：《忘我参加抗日救护工作》，原载于《中山文史》第六十二辑。文章标题及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教互学过程中，要求每个队员能够独立工作。加强军民合作、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思想教育，也是我们的必修课。另外，我们每周到叠石前线为海防士兵治疗小伤小病，很受欢迎。有些士兵生癣疥，是因睡觉地方卑湿所致。我们除了为他们施药治疗外，还向所属部队领导提出意见，及时改善驻地卫生。叠石失陷前夕，我们集中在青岗待命。青岗救护队员全部武装起来，上山警戒。我们也派队员协同工作。敌寇越日退出，部队仍作警戒，坚守阵地。我们护理之余，协助农民收割，集合儿童教唱《长城谣》。当叠石山下的哨兵被子弹擦伤头皮，流血不止，而又值双方对峙，伤员不能离开岗位之际，我们队伍里的黄英杰奋起爬到受伤者身边，接过武器，代立岗位，使该伤员得以及时退下包扎。

我们值勤和临时集中的通知，原用电话传呼。后来决定炮声、炸弹声便是集中的讯号。这样一来效果很大。好几次敌机轰炸石岐，我们的值班人员，哪怕是三五人，也同样拿起药箱器材，奔赴灾区作紧急抢救，接着全队人员也赶到了。当横门前线的伤员救护站临时设在长江村口的先锋庙时，伤兵越来越多，出入顿时热闹起来。这引起敌人注意，派机前来侦察。站内伤兵数十名，有点恐慌。我们安定大家情绪，劝勿擅离。敌机盘旋三匝后，实行火力侦察，机枪扫射，庙侧大树枝叶纷飞。有些伤员受惊，正想外逃。但当时他们见到在场的救护队员冯笑容、缪佛生等若无其事坐在桌旁大做棉花球时，他们也就不再慌张了。敌机离去后，这些“老差骨”议论说：“我们看，人家20多岁的姑娘，还是这般镇定，不怕敌机，我们想动也不敢动啦。”有些伤员还竖起大拇指，称赞我们队员够胆色，有志气。

广州沦陷后，敌寇继续占据江门、容奇等地。中山形成被包围和分割出三角洲的局面。国民党当局把中山划为游击区，军事上独立作战，没有给予后援。敌寇则不断出动炮艇骚扰叠石、横门海边和容奇以西的中山边境。叠石首当其冲，日军先后登陆三次，炮击数十次，占据一次。

1938年夏季的一天，县长张惠长到叠石检阅部队，并另成立一个预备地点——豪吐龙船地。当时由于汉奸告密，部队未集中，敌机就来轰炸，向居民住宅区投弹，塌屋多间，死伤十数人。我队和各村救护队、工作团纷纷出动，奔赴灾区。正当抢救挖掘伤亡群众之际，敌机由龙船地转头回

来，继续向灾区投二弹。当时血肉和硝烟齐飞，群众切齿。事后检查：申明亭救护队杨丽容中弹殉职。我的右臂中弹片，流血如注。幸好龙头环救护队见状，迅为包扎。敌机离去后，我撤离灾场，交余骅继续指挥队员工作。涌头第十五工作团派人送我去民众医院。当天陆续到该院医疗枪伤的有五、六人，有些敷药后自行回家。杨丽容的尸体运回申明亭村口收殮。翌日，开追悼会和出殡。国民党省府委员伍智梅、县长张惠长、党部周守愚和群众团体千余人都来参加。叠石村人为表哀悼，在村口立碑勒铭，供人凭吊。我右臂取出弹片后，活动自如，参加追悼会时，备受各方人士的慰问。这使我深受鼓舞。

敌寇在进攻横门的第9天突然用200多艘艇，运兵千余，向叠石登陆。这次日寇仗着兵力优势，直达石岐。中山便遭初次沦陷。我救护队随部队和机团退至三区森树围待命。第三天闻敌寇从叠石退回江门，我们又与部队配合，分头搜索全区和协助收复石岐，整顿秩序。那时我们已经从一般的救护队锻炼成有战斗能力的队伍。

横门抗敌的枪声打响了。第二天下午，县卫生院鲍爱公医生来电话要求二区救护队开赴横门前线支援。我们全队人员当天步行上石岐，随又沿公路徒步奔赴前线。到达张家边时已是午夜。天亮后，带队的卫生科职员已回石岐。我队副队长余骅及王树芬到指挥部报到及领伙食。但指挥部尚无一人。而我队队员一夜未睡，饥肠辘辘，如何开展工作？如果临阵撤回，势必影响军心。余、王两位，只得敲开杂货店门，自掏腰包，买了半筐饼食，分给大家裹腹，隐瞒领不到伙食的事。两位的风格，直至今天谈起，仍令人赞许。一连两天搞战地救护，有不少动人事迹。第四天，伤兵站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而伤员由10来人增至70人，护理人手严重不足，住处也有困难，附近几间瓦屋也挤满了。伤病站极力要求指挥部将我们救护队调来。于是我们到伤病站日夜工作起来。不料，仅两天就给敌人察觉。敌人多次派机到来低飞盘旋和扫射，幸无大损失。鉴于伤员众多，药物和伙食也难解决，指挥部决定紧急疏散。轻伤的候车送返石岐医院治疗。不便行走的重病号，由我们救护队用担架抬至公路旁，候车送往澳门镜湖医院医治。忙了一天一夜，伤员才安置完毕。完成任务后，指挥部要我们休整一两天。于是大家一起回到二区来。人员虽一个不少，可是

每个人都掉了几斤肉。

休整后，我队又开赴横门去。当时无战事，指挥部也冷清清的。当我队到达后，被分配的任务是去防空洞搜尸骸，交掩埋队处理。原来当地居民很多饿死或病死于防空洞里。尸体日久腐臭。掩埋队员强调工作只是掩埋，拒不入防空洞拖尸。指挥部却派给我们这一任务。为了环境、为了振奋群众抗战决心，我们毅然把这项工作承担下来。

第二天横门的炮声又响了，日寇随即又从叠石登陆，中山第二次沦陷了。

### 转战全国的救护自愿者

在中山的抗日救护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放眼全国，凡有日寇侵略之处，必有军民奋起之抗战，也需要抗日救护工作。中山的许多优秀儿女，奔赴祖国各地，用他们的满腔热血参与救护工作，救死扶伤。小榄下基小学教师谭则刚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奔赴全国各地的救护工作者行列。

（以下是谭则刚讲述）1938年，华南局势紧张。我为了进一步参加抗日工作，于8月中旬，离别家园到广州万国缔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南区大队参加救护工作。

……

虽然参加救护工作，终日在敌机的机影、炮声下奔波，驻地也多次被炸，然而我反觉得很有意思。救亡图存，全民有责！

祁阳整编后，原南区大队基本改编为第四救护大队，移驻桂林，负责四、七战区救护协助事宜（曲江社第七中队，由波兰人戎格曼为中队长，后才成立第七大队）。

1944年，战局逆转，长沙、衡阳失守。6月，桂柳大撤退，民众向湘黔疏散，救护队沿途设站，做军民的救治工作。运力紧张，爆声处处，我们虽九死一生而犹未悔！

值得一记的是：我们因汽车损坏在宜山车站停下修理时，忽有人远隔百米呼唤：“老谭，做了山大王吗？”

原来是我在柳州认识的越南劳动党驻柳州（约700人）训练部队的领

导人之一黄文欢<sup>①</sup>同志。之所以与之认识，缘于我的一位劳姓朋友在柳州河南驾鹤下路7巷3号木屋下层开办“三余学社”，当时我兼任教员，而黄则一个人居住楼上，成为邻居之故（第四大队亦曾援助他们药品）。

我趋前交谈。原来他是奉命率队前往百色集训的。（“文革”后，他受越南黎笋的迫害，到北京政治避难。从电视观之，音容笑貌如昨。国际交谊，一生难忘！）

此后，我们沿途坚持救护工作，基本上都是最后撤离的。一路但见抛妻弃儿，哀鸿遍野。我也几遭车祸或被乱军所枪杀之险，可谓九死一生。1944年12月7日，我们到达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集中，知道了护士梁爱珊途中暴毙于贵州尤里。梁原在小榄女高（和丰书院）任教多年，住在小榄刘家巷，于1944年夏辗转由中山来柳州参加红十字会第四大队救护工作。抗战八年，我红十字会同仁驰骋疆场而牺牲的不在少数。我在总队办公大棚前，摩挲纪念碑，望慕无穷！然抗战胜利至今，此纪念碑不知犹与日月同光否？

原来救护总队正拟于12月8日撤往西昌，恰天降暴雪，日寇占驻贵州独山后，后勤不继。我张雪中<sup>②</sup>部队又阻敌于湖南芷江，使日寇不能前进。敌后群众纷纷武装拦击，日寇退守广西河池。我们便不再向西昌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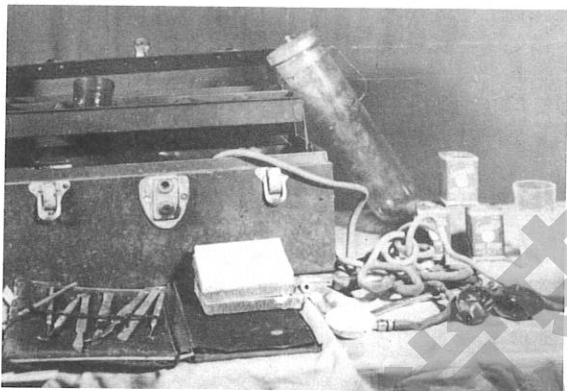
1945年3月，我随队推进都匀，继续协助作军民救护。公余，我常到北门外一石桥附近散步。该石桥护栏刻有革命标语：“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相传是当年红军长征遗迹，只褪去颜色，鼎立千秋！

<sup>①</sup> 黄文欢（1905—1991），越南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

<sup>②</sup> 张雪中（1899—1995）江西乐平人，原名张达，字通明，国民党陆军中将军。

【延伸阅读】

## 中山抗日游击队的战场救护及医疗卫生工作



游击队用过的医疗器械

中山抗日游击队初创时期，缺医缺药，仅靠一些爱国医师义务为部队治疗部分伤病员。这是游击队医疗卫生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适应战斗医疗需要，抗日游击队于1943年底在五桂山槟榔山村举办了两期卫生员培训班（代号海珠桥），培训

学员50多人，还选派部分卫生员到澳门名医招兰昌处及镜湖医院培训、深造，为将来的中区纵队、珠江纵队培养了大批医疗卫生骨干。

1944年2月，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设立了卫生室，负责人周扩源、邓碧瑶、潘仲。并在群众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网。大队设有医疗室，中队均配有卫生员。此外，在群众的支持下，还在若干较隐蔽的地方建立伤病站，以治疗重病号和伤员，如大布村是义勇大队的伤兵总站。在药品短缺的情况下，部队鼓励卫生战士们向民间中医学习，上山采药，运用土方土法医治伤病员，不同程度地减少了流感、疟疾、脚气、夜盲症、疥癬等疾病对指战员的威胁。

在众多爱国医生中，三乡的爱国人士、基督教徒、西医刘帼超医生是其中的佼佼者。她长期无偿为五桂山游击队治病和培训医务人员，还在家里专门修建了一座医务室，取名“桂园”，专门作为部队的伤病员医病、女战士分娩育婴的隐蔽地方。“桂园”被游击队员们亲切称为“后方医院”。

〔整理自《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卷），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